

哲學的貧乏：唯實論與後福特主義(上)*

The Poverty of Philosophy: Realism and Post-Fordism (1)

亞歷山大·蓋洛威(Alexander R. Galloway)

王聖智/譯

瑪拉博(Catherine Malabou；法國哲學家暨英國 Kingston 大學哲學系教授)於近年出版一本專書，檢驗當今大腦概念中的意識形態奇想，並於該書中提出下列問題：「我們應如何使大腦意識不再從根本上與資本主義精神完全一致？」¹ 本文靈感即衍生自這本專書與這項提問。

就其本質觀之，這便是我所欲探討的難題。瑪拉博的提問雖主要聚焦於大腦，卻引起廣泛共鳴，因為該項提問直指某些新興哲學思想謬誤之處。為何在當今大陸哲學研究的復興浪潮當中，各種本體論系統(ontological systems)之結構與後福特主義式資本主義(post-Fordist capitalism)所發展出最先進科技之結構完全一致？在此所謂結構一方面是指各種電腦網絡，特別是物件導向(object-oriented)的電腦程式語言(例如 Java 或 C++)，另一方面則是指某些唯實論(realism)哲學家如拉圖爾(Bruno Latour)，特別是梅亞蘇(Quentin Meillassoux)、哈曼(Graham Harman)，以及他們被歸類與指稱的思辨唯實論(speculative realism)學派。為何這些哲學家在鏡映自然時，於鏡中所見卻是後福特主義式資本主義的生產模式？簡言之，為何當今各種本體論與大企業使用的軟體完全一致？

然而，這種一致性(congruity)仍須透過論證方能被顯示出來，這便是本文的任務。欲證明這種一致性確實存在，必須先處理下列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關於本文理論書寫內容的有效性(validity)。換言之，倘若新興的唯實論哲學的確模仿當代資本主義之基礎建設，難道我們不應單就這項事實而摒棄之？摒棄之理由在於下列這項假定：任何當代意識形態的重新包裝顧名思義均具有反科學傾向，因此在認識論層面亦為不可靠的。第二個問題是關於政治實用性(utility)。換言之，即使我們忽略唯實論哲學在認識論層面的缺陷，難道我們不應單純基於政治理由而批判之？批判之理由在於任何試圖以類似腹語術方式表現當今產業布局之哲學計畫將因此被視為某種政治倒退。

這促使我們進一步提出圍繞上述提問的第二波問題，包括各種關於批判性思考本

* 原刊於《藝外 ARTITUDE》，2014 年 7 月號，第 58 期，頁 74-83。

質之問題，和針對物件(object)與事物(thing)、物件與文字(word)，以及物件與觀念(idea)等古老區別之分析。這些提問與分析認為，我們必須回歸唯實論與唯物論(materialism)的古典辯論。現象學(phenomenology)亦將在其中扮演某種角色，因為這門枯燥學科必然在這些問題周遭陰魂不散。也許，我們最終將重新發現某種特別的唯物論。這種唯物論探求事物本身的歷史事實，始終留意在世界中的存在(presence)所發揮的道德影響力，並給予這種影響力應得的注意力。

一、巴迪歐(Alain Badiou)與 Java

在直接討論對唯實論哲學之挑釁前，為了感受瑪拉博的完整挑戰力道，我們必須先退一步探討當代世界的本質，以及在其中進行的相關哲學研究。換言之，我們必須探問，什麼樣的論述是有效的，當代資本主義精神為何，以及這兩者如何能夠產生關聯。

巴迪歐(法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家)為當代大陸哲學之重要人物，尤其是過去十年來其著作以英文出版之後影響更為深遠。他曾指導並影響包括梅亞蘇在內的眾多思辨唯實論哲學家。巴迪歐的「回歸真理」(return to truth)概念與梅亞蘇的「回歸真實」(return to real)概念雖非完全相同，至少十分相似。這兩位人物皆勇於追求絕對性，並摒棄後現代主義中的社會建構論。我已於巴迪歐的著作中發現集合論(set theory)與某些電腦語言設計的相似之處。巴迪歐的著作與軟體和演算法系統的共通處之多，可能遠超乎其想像。巴迪歐的本體論直接受到集合論影響，其本體論中的關鍵概念與物件導向電腦語言設計的關鍵概念之間具有某種神祕的同源關係(homology)。正如電腦史學家所證實，物件導向電腦語言確實是源自系統理論與集合論之原則。²此乃相當重要的一項認識，因為物件導向電腦語言佔據一塊今日全球工業基礎建設中的重要利基：作為軟體，它們掌控了新式自動化汽車廠，流暢地將企業總部與電話客服中心同步化，並使得 Google 和 Facebook 等公司能夠高效率地處理數百萬項客戶需求。巴迪歐的《存有與事件》(Being and Event)是否隱含一個電腦資本主義核心(cybercapitalist core)基礎？答案或許為否。至於巴迪歐與 Java 或 C++ 程式語言描述這個世界之方式是否具有某種相似性？我認為是。以下將透過勾勒這種同源關係來開展本文之論證。

首先，我們須闡述巴迪歐借用自集合論的兩項關鍵概念：**屬於**(belonging)及**包含**(inclusion)。巴迪歐採用形式定義的語言將這兩項概念闡述如下：「集合論從不同的眾數(multiples)中區分出兩種可能關係。一種是起源(originary；譯註：巴迪歐原文為 originary，作者誤植為 ordinary)關係，亦即**屬於**...意指某個眾數被視為是呈現於另一個眾數當中的一個元素。另一種是包含關係...意指某個眾數被視為另一個集合的子眾數。」³換言之，若被標註為 x 的某物被呈現於情境 y 當中，且被認為是存在於情境 y 當中，則我們稱某物 x 屬於情境 y。相對而言，若某物 x 的所有元素亦為情境 y 當中的元素，則我們稱情境 y 包含某物 x。因此，

包含的概念可被理解為親子關係，家長的所有元素均再現於小孩身上。由於小孩除了顯現家長具有的元素之外，亦包含其他元素，因此，家長便被指涉為小孩的子集合(儘管家長相對於小孩而言具有邏輯上的優先性)，也就是說，家長具有的元素再現為小孩身上所有元素的一個子集合(或相同集合)。因此，當某個集合包含某個子集合時，該子集合相對於該集合而言便具有邏輯上的優先性。

必須說明的是，本文採用的呈現(presentation)及再現(representation)二詞指涉意義不同。巴迪歐具體說明屬於乃一種呈現事實，而包含則為一種再現事實。⁴換言之，若 x 屬於 y ，我們稱 x 被呈現於 y 當中；若 y 包含 x ，我們則稱 x 被再現於 y 當中。做此區分之原因在於屬於乃關於事物如何出現於情境中之問題(亦即事物如何被呈現於情境中)，而包含則是關於母體如何將自身複製為其子體元素的子集合之問題(亦即母體如何被再現於其子體當中)。

這兩項概念可謂巴迪歐於《存有與事件》書中大部分數學推論內容之發展基礎。事實上，這兩項概念不僅是界定冪集公理(power-set axiom)、情境狀態、單元素集合 singleton)，以及集合為一律(law of forming-into-one)等概念之基礎，亦為巴迪歐發展如事件、真實性(fidelity)、發生性(generic)，以及力迫(forcing)等各種代表性概念之原料。

Java 乃首批不需平台的物件導向程式設計語言。有鑑於此，本文目的並非深入探討《存有與事件》或《世界的邏輯》(《存有與事件》第二卷)之內容，而是進一步將上述巴迪歐提出的兩項基本概念與存在於 Java 規範中的一組相關概念做比較。我們必須承認各種物件導向語言如 Ruby、C++、Objective-C，以及 Lisp 等所使用的符碼存有眾多差異，但為簡潔有效說明起見，本文以 Java 代表整個物件導向典範。

Java 規範描述了這種物件導向語言執行時的若干面向，其中兩個面向與前述巴迪歐的兩項基本概念密切相關。第一是**成員**(membership)。物件導向語言乃圍繞著**類別**(class)概念或某種符碼模組的抽象描述組織而成，**物件**(object)作為一種確實存在的類別即為此概念之實例。「成員」意指構成物件之資料結構。一個物件的成員可包括變項、方法，或其他宣告(declarations)。這些成員可由類別內部宣告，或來自此物件所屬的母類別之成員。⁵

此種親子關係指出 Java 規範中與巴迪歐概念相關的第二個面向：**繼承**(inheritance)。各個類別可透過繼承其他類別的所有(或部分)特點來擴展那些類別。我們稱此過程為**擴展**(extension)。以慣用術語說明，被繼承的類別稱為母類別或父類別(superclass)，而進行繼承的類別則稱為子類別(subclass)。⁶據此定義，我們思考下列子類別與父類別之假設關係：一個被定義為「紅蘋果」的類別亦可被定義為「蘋果」這個父類別之擴展，因為前者繼承了後者的所有特點；後者又可被定義為一個更高類別之擴展，例如「一種水果」，因此「蘋果」與「紅蘋果」皆將繼承「一種水果」的特點而成為其分支。

巴迪歐概念內涵與Java規範面向之相似性於此嶄露無遺。巴迪歐所稱屬於關係，Java則稱成員關係；巴迪歐所稱包含關係，Java則稱繼承關係。當巴迪歐探討某個眾數如何能夠屬於另一眾數時，他的推論邏輯便等同於電腦程式設計師在探討某個成員變項如何能夠被定義為某個類別之成員時所依據的邏輯。換個角度，當巴迪歐探討某個眾數如何能夠成為另一個眾數的子眾數以包含該母眾數的所有元素時，他的推論邏輯便等同於電腦程式設計師在探討某個新定義之類別如何能夠擴展某個既存類別以繼承該既存類別的所有(或部分，視父類別如何被定義)成員變項與方法時所依據之邏輯。簡言之，巴迪歐本體論所賴以建立之屬於和包含邏輯，與今日各種物件導向電腦語言所賴以建立之成員和繼承邏輯完全相同。

我在前述內容已提示，由此推導出來的結論或許有點令人不安。這種物件導向電腦語言本身乃資訊經濟之基本構成核心，其若非等同於當今的生產模式，至少與之具有密不可分之聯繫。世界上許多極高度資本化的公司均為以物件導向基礎建設起家的軟體公司(例如 Google、Cisco Systems、IBM，以及 Facebook)；而許多最富有的商業巨賈均以資訊科技為業(例如彭博[Michael Bloomberg]，估計身價二百二十億美金；蓋茲[Bill Gates]，估計身價五百六十億美金)；幾乎每個產業面向在今日均被重組，以適應軟體的能供性(affordances；指物件特性及其可使用方式之關係)與興衰(例如電子化貿易與生物資訊學)；而這類軟體絕大多數均以物件導向語言寫成，例如 C++、Ruby 或 Java。此外，物件導向電腦語言不僅決定了商業結構，更大幅影響我們用以辨別、捕捉，以及協調身體與物件之邏輯。依此觀之，阿格雷(Phil Agre)的著作便具有某種工具性，特別是他對捕捉邏輯以及身體與物件在資訊網絡中清楚表達的各種行動措辭之分析。⁷ 因此，認為當代生產模式與物件導向電腦語言之間具有相當特殊之關係這項宣稱並不牽強，正如五十年前和一百年前的人們可能宣稱當時的生產模式各自與製造業裝配線和蒸氣引擎之間具有特殊關係。簡言之，Java 與其他物件導向電腦語言乃用以建設當代後工業基礎設施之優異工具。但我們不應對之抱持任何幻想(譯註：因為終究會被新科技取代)。

巴迪歐談論本體論之方式與資本主義建構其商業物件世界之方式相同，無疑是一項令人不安的發現。⁸ 然而，僅發現形式上的一致性並不代表什麼。世界上有許多結構亦「看似」其他結構。我們必須格外警惕，不應如數秘術(numerology)崇拜數字那般盲目迷信形式。儘管如此，我們是否仍應責無旁貸地質問此種一致性？既然梅亞蘇與其他學者近來已針對關聯主義(correlationism)提出強烈批判，為何又會出現對這種更為基本的關聯性之追求？我們確實不能將巴迪歐與 Java 之間的關聯性單純解釋為某種巧合。正因如此，我們才必須探問：應如何使我們對這個世界之理解不再從本質上與資本主義精神完全一致？

二、唯實論的回歸

本文接下來將討論與觀察範圍擴展至唯實論，以便回答這些重要問題。⁹於此脈絡下，唯實論單純意指在我們本身以及我們的語言、思想與信仰之外確實存在著一個外在世界—即使這種本體論必然牽涉到下列這項較複雜的認識論命題，亦即我們能夠獲得關於這個外在世界的直接且可被證實之知識。在康德主義、現象學，以及結構主義盛行之後，唯實論基本上已消失於大陸哲學傳統之中，但其分支卻於英美分析哲學，特別是科學哲學當中成長茁壯。然而，此情況約於 2002 年產生轉變。德蘭達(Manual De Landa；墨裔美籍作家、藝術家與哲學家)於該年出版一本探討德勒茲之專書《強化科學與虛擬哲學》(Intensive Science and Virtual Philosophy)，以明確語氣宣稱「我是一位唯實論者。」同年，哈曼出版其第一本專書，提出一種圍繞所謂物件導向哲學而發展的唯實論。¹⁰

梅亞蘇之著作《有限之後：論偶然的必要性》可算是近年來最具影響力的唯實論文本，該書建議人們應超越梅亞蘇所稱之關聯主義，並使自身思想與絕對性(the absolute)相互調和、達成一致。梅亞蘇所稱之關聯主義是指關於這個世界的知識始終是主體與客體關聯性之產物。他進一步寫道：「所謂『關聯性』是指我們僅能觸及思考與存有之間的關聯性，而無法將兩者分開思考。」¹¹在關聯主義系統中，主體性與客體性永遠緊密相連。如此，我們可能會理所當然地因康德的主體-客體高度中介模型而將這號人物歸類為關聯主義者。欲探討關聯主義發展史以及因人類無法超越語言牢籠之困擾而興起於 1960 年代與 1970 年代間的眾多法國哲學運動，現象學亦為一個關鍵切入點。後現代主義被認為是關聯主義的指標性體現與發展高峰，尤其是下列這項不分青紅皂白被歸屬於後現代主義思維之觀點，亦即主體最終將受到背後缺乏絕對真理或實在的意識形態與景觀(spectacle)所支配。人類主體性總是在關聯主義中扮演關鍵角色；真實世界並不存在，即便真的確存在，我們亦無法直接觸及它。

梅亞蘇堅決反對關聯主義在大陸哲學中的長久傳統。他認為真實世界的確存在，且可被人類理解。梅亞蘇亦支持所謂的「哥白尼革命」(Copernican revolution)，亦即用一套以實在(reality)為中心的體系取代關聯主義的人類中心論，而人類僅為真實世界網絡中的一項元素。布莱恩特(見註 9)與其他學者稱此為平坦的本體論，由單一平面，亦即真實所構成，而人類思維與文化僅為此真實網絡中的一項元素。¹²

梅亞蘇在《有限之後》題為「先祖性」(Ancestrality)的序章中藉由指涉已掌控西方哲學一段時間的康德式陷阱來說明非關聯主義立場之基本樣貌：「思想無法為了比較『自身即為世界』的世界與『為我們而存在』的世界而超越其自身...我們無法再現『物件自身』，除非物件先『為我們而存在』，或如同黑格爾的風趣說法，我們無法『從物件背後躡手躡腳地湊上去』，以便得知此物件在本質上究竟是什麼」(AF, pp. 3-4)。梅亞蘇並不想從物件背後躡手躡腳地湊上去，而是假定一個存在於人類認知之外的歷史時間尺度，亦即在人類出現之前的歷史時間。因此他提出「先祖領域」(ancestral realm)與「元化石」(arche-fossil)等概念。「先祖式」

(ancestral)概念是指稱人類出現之前的事物，亦即在現象學者所稱人類經驗之「給定性」(givenness)確立之前便已存在之事物；「元化石」則為種種指向先祖性之證據。舉例而言，放射性衰變即為一種「元化石」，使科學家能夠對史前化石進行定年。梅亞蘇提出下列問題作為這些對關聯主義挑釁之高峰：即便關聯主義對這種「先祖式」宣稱有置喙之地，這些相關事實嚴格說來將存在於主體-客體關係出現之前，並因此存在於關聯主義提出其模型之前。倘若人類思想有個起始點，我們又該如何思考人類思想發端之前的歷史？科學以王牌之姿興起，與此同時，梅亞蘇向反對其觀點的關聯主義者提出下列問題：「我們該如何設想經驗科學產出有關先祖領域知識之能力？」(AF, p. 26；原文強調之處已移除)

該書開端小節亦強調數學的重要性。梅亞蘇描述一道謎題，其中數學被賦予說明人類出現前的歷史過程之能力：「數學論述如何能夠描述人類出現之前的世界...這是我們必須面對的一道難題，亦即數學論述這個廣大世界之能力、論述人類與生命出現之前的歷史之能力」(AF, p. 26)。在這段話之前，梅亞蘇在討論數學的主要特質時提到：「所有可用數學語彙描述的物件面向均可被認為是該物件本身的重要屬性」(AF, p. 3；原文強調之處已移除)。

梅亞蘇對「先祖領域」概念之運用使其開創出一個純粹真實的世界，一個人類所未見或人類所未思及的世界。梅亞蘇寫道「思考先祖性即為思考一個沒有思想的世界，一個缺乏其本身給定性的世界」(AF, p. 28)。

「世界的給定性」一詞乃一窺現象學如何談論「存在」之參照點。這個詞彙指涉的是某個具思考能力之生物如何將世界給定為其感知。對此，梅亞蘇寫道：「相反地，我們的任務在於嘗試理解思想如何能夠觸及非關聯之物，亦即一個不須被給定便可存續的世界。」梅亞蘇認為，完成此任務之關鍵即在於「無給定性之存在」。因此，他將絕對性理解為某種「無論人類存在與否均能夠存在」之事物(AF, p. 28)。

我們該如何評判梅亞蘇的論點及其對當代哲學之影響？¹³我想到某些切入點，全都是關於梅亞蘇與政治和歷史之關係。我先以相對而言較模糊的語彙談論兩項批判，隨後再討論第三項較為直接的批判。

首先是其本身在形而上學層面的必要性問題，無論此問題是以本質主義(essentialism)、絕對性、自然實在(natural reality)或普世真理之形式出現。所有這些事物在某個時刻均反對人們廣義所稱的批判理論，亦即馬克思(Karl Marx)於十九世紀中葉創建的社會文化批判實踐，隨後透過法蘭克福學派、結構主義與後結構主義、符號學、文化研究、酷兒理論、女性主義，以及批判種族理論在整個二十世紀的應用而獲得多樣化發展。馬克思以建構式認同與各種偶然世界取代本質及真理(試回想馬克思與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在《共產主義宣言》第二卷中如何承諾要摒除真理!)。若我們認同新興的思辨唯實論或哈曼的物件導向哲學，我們便須承擔由一個主觀本質主義系統(家父長制、邏各斯中心論

[logocentrism]、各種意識形態機器)轉換至一個「客觀」本質主義系統(未被中介的實在、無限、作為數學之存有、絕對性、混沌泡沫[bubbling of chaos])之風險。現在是否是時候重提那些由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以及後殖民主義前輩所發展出來的古老反本質主義論點？梅亞蘇的形而上本質主義——亦即他對偶然性(contingency)的普世性之支持(此種偶然性在無效普世性中將變得毫無意義)、對絕對性之追求，以及對純粹實在之認同——是否如同其他形而上本質主義分支那樣令人反感？

如此一來，我們便須直接面對這種新興唯實論之挑釁。相對於馬克思以來的唯物批判理論傳統，今日大多數的唯實論均宣稱無論何種本體論都不應是政治性的，任何本體論思辨均應與政治思辨分離。此種言論於今日越來越頻繁可聞。可以確定的是，許多與當今唯實論有關者必然自視為政治化的重要人物。我們也常聽到下列論點：使本體論與政治性脫勾之舉措本身是無害的，亦不會對政治工程造成任何詆毀或損害。人們可以單純地在某處研究形而上學，而在另一處從事政治。此外，這種論點的傳播者通常將本體論與政治性之脫勾稱頌為唯實論之特徵而非累贅，因為此種脫勾使得政治性得以存續於其自主範疇，不受存有與顯現等實質問題之干擾。

然而，這種本體論領域與政治性領域之脫勾並非完全無害，它並非某種欲整理雜亂哲學論述的無害企圖(為使人們對存有之談論不至於干擾人們對政治之談論)，而是某種無論有意無意皆亟欲消滅與其競爭之論述的意識形態策略。這使人想到我們顛覆關聯主義時所須摒棄之物。我們必須摒棄現象學，這無庸置疑。除此之外，我們亦須摒棄社會建構論及仰賴社會建構方法論的各種研究領域，包括第二波與第三波女性主義、某些批判種族主義分支、廣義的認同政治研究、後現代性理論，以及文化研究。不可否認地，現象學具有某種政治目標：超越當代生活之蹂躪，透過關懷與掛念之引導，回歸到一個更富想像力的存有狀態。社會建構論亦具有某種政治目標：摒除家父長制、邏各斯中心主義，以及其他相關產物的暴力。這即為近來回歸至對絕對性之關注的利害所在，此種回歸展現於梅亞蘇至巴迪歐的理論論述中，甚至展現於其他學者如齊澤克(Slavoj Žižek；斯洛維尼亞社會學家、哲學家與文化批判家)與芭克-摩絲(Susan Buck-Morss 紐約市立大學政治系教授)之論述中。¹⁴ 可以確定的是，這些理論家當中有些人了解到利害與風險所在，進而採用某種堅定的、且通常為激進的政治理論來支撐他們新發現的普世主義。我們必須牢記，巴迪歐與齊澤克絕非倡導共產主義，而芭克-摩絲本身亦具有某種堅定的政治意識。他們並非易謝的紫羅蘭(譯註：出自濟慈詩作《夜鶯頌》)。然而，當某位哲學家為了全然從政治批判工程中撤退而將存有與政治脫勾時，解決這道難題便更為當務之急。

註解：

1. Catherine Malabou, *What Should We Do With Our Brain?* trans. Sebastian Rand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12.
2. 例如 Bjørn Kirkerud, *Programming Language Semantics: Imperative and Object Oriented Languages* (Boston, 1997)。David Golumbia 亦提供某些關於物件導向程式設計之歷史背景 David Golumbia, *The Cultural Logic of Computation* (Cambridge, Mass., 2009), pp. 209-11.
3. Alain Badiou, *Being and Event*, trans. Oliver Feltham (London, 2005), p. 81; 以及 pp. 44, 501, and 511.
4. 「一旦某個眾數被視為某情境的一份子[亦即屬於]，該眾數便察覺自身被呈現於該情境當中。若該眾數亦被視為元結構(metastructure)的一部分[亦即包含於其內]，或該情境之狀態，則我們可稱該眾數被再現於該情境當中」(同前引書，頁 99)。此種呈現與再現的組合關係使得巴迪歐能夠設想若干有趣的情節，例如被呈現但未被再現之事物、被呈現亦被再現之事物等等。
5. James Gosling et al., *The Java Language Specification* (New York, 2005)，特別是 secs. 4.4、8.1 與 8.2。我們可以且更應關注某種 Java 的批判理論，遑論整體而言關於電腦語言之理論。開啟此種對話的一本重要著作為 Adrian Mackenzie, *Cutting Code: Software and Sociality* (New York, 2006)，特別是第五章“Java: Practical Virtuality”。
6. 我們必須注意某個容易混淆之處：電腦科學家稱被繼承的類別為父類別，而巴迪歐則稱被包含的母眾數為子集合。一方稱之為父者，另一方則稱之為子，但兩者應被理解為等同物。
7. Phil Agre, “Surveillance and Capture: Two Models of Privacy,” in *The New Media Reader*, ed. Noah Wardrip-Fruin and Nick Montfort (Cambridge, 2003), pp. 737-60.
8. 本文開頭討論巴迪歐的段落既非暗指巴迪歐屬於所謂的思辨唯實論學派，亦非暗指他與當代唯實論落入相同的政治陷阱。巴迪歐解決此種唯實論困境之方法，便是將其本體論與另一個同等嚴謹的政治理論相連結。
9. 我對於唯實論之興趣源自於被稱為思辨唯實論之哲學運動。哈曼、葛蘭特(Iain Hamilton Grant；英國西英格蘭大學資深講師)、布萊席耶(Ray Brassier；黎巴嫩貝魯特美利堅大學哲學系教授)，以及梅雅蘇在 2007 年四月舉辦於倫敦大學金匠學院的一場研討會中決定「思辨唯實論」這個名稱。參閱期刊 *Collapse* 專門討論此主題之各卷，特別是 *Collapse 2* (Mar. 2007)，以及 Ray Brassier et al., “Speculative Realism,” *Collapse 3* (Nov. 2007): 307-449。布萊恩特(Levi Bryant；美國科林學院哲學系教授)強調，這場運動(若真有此運動)內部是相當多元化的：

「若真如哈曼所言，思辨唯實論者之間具有某種統一性(unity)，這種統一性乃源自於他們共同反對之物，而非他們的共同立場。換言之，連結思辨唯實論者的共同思路乃針對關聯主義與反唯實論典範思維的某種不滿。就此而言，若干「思辨唯實論者」不指涉自己為思辨唯實論者的這項宣稱並非完全不正確。舉例而言，在某種解讀下，德勒茲可被歸類為此學派。德蘭達與懷海德(Alfred North Whitehead)當然屬於此學派。哈曼認為拉圖爾(Bruno Latour)屬於此學派，我亦將史登葛爾絲(Isabelle Stengers; 比利時哲學家)歸類為此學派。參閱 Levi Bryant, "Object-Oriented Philosophy: What Is It Good For?" 5 Feb. 2009。

10. 參閱 Manuel De Landa, *Intensive Science and Virtual Philosophy* (London, 2002)，以及 Graham Harman, *Tool-Being: Heidegger and the Metaphysics of Objects* (Chicago, 2002)。亦參閱 Lee Braver 對於大陸哲學長期抵制唯實論現象之評論，Lee Braver, *A Thing of This World: A History of Continental Anti-Realism* (Evanston, Ill., 2007)，以及 Jane Bennett, *Vibrant Matter: A Political Ecology of Things* (Durham, N.C., 2010)。哈曼對於物件以及更廣泛的關於物件與事物之人文學科同感興趣。特別參閱 Daniel Miller 關於購物與事物之著作、Bill Brown 關於物件與消費文化之著作、Bruno Latour 對於物件網絡之自主能動性(autonomous agency)之討論，以及下列兩卷編輯專書：*Evocative Objects: Things We Think With*, ed. Sherry Turkle (Cambridge, Mass., 2007)與 *The Object Reader*, ed. Fiona Candlin and Raiford Guins (New York, 2009)。另一項相關運動亦圍繞著美學領域之相對自主性而興起。這已於德勒茲在 1980 年代的美學時期，特別是在其討論電影與繪畫之若干專書中獲得證實，在其中，德勒茲探討感受能力(affect)如何被表達為這個世界上的各種人工過程(machinic processes)；關於這一點之說明亦見於洪席耶(Jacques Rancière)透過美學建制本身的相對自主性來突顯這種建制之著作。讀者亦可將此與下列文獻做比較，包括 Slavoj Žižek 若干著作中提到的信仰客觀化理論(theory of the objectification of belief)、W. J. T. Mitchell, *What Do Pictures Want? The Lives and Loves of Images* (Chicago, 2006)、Barbara Stafford, *Echo Objects: The Cognitive Work of Images* (Chicago, 2007)，以及 Jonathan Beller, *The Cinematic Mode of Production: Attention Economy and the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 (Lebanon, N.H., 2006)。

11. Quentin Meillassoux, *After Finitude: An Essay on the Necessity of Contingency*, trans. Brassier (London, 2008), p. 5；後續提及以縮寫 AF 指稱。

12. 布萊恩特稱自己為馬克思主義者與唯物論者，同時卻又提出有關思辨唯實論與物件導向本體論之論述。布萊恩特認為，除了文化領域甚或存有領域之外，唯實論亦須關注物質基礎。他因此將此途徑稱為一種「差異本體論」(onticology)而非「本體論」。如此一來，布萊恩特便更偏向德勒茲式傳統，而哈曼則延續拉圖爾式傳統。Bryant, *The Democracy of Objects* (Ann Arbor, Mich., 2011)，特別是第四章與第五章對此有更進一步之闡述。

13. 在美國，克里奇利(Simon Critchley；英裔哲學家)乃第一批回應梅亞蘇著作的學者之一。另外兩位在英國研究大陸哲學之重要人物－托斯卡諾(Alberto Toscano)與霍爾瓦德(Peter Hallward)亦曾回應梅亞蘇之著作，其中霍爾瓦德之文章拋轉引玉地促使布朗(Nathan Brown；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英語系助理教授)撰寫一篇有趣文章作為延續。參閱 Simon Critchley, "Back to the Great Outdoors,"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28 Feb. 2009, p. 28; Alberto Toscano, "Against Speculation, or, A Critique of the Critique of Critique: A Remark on Quentin Meillassoux's *After Finitude* (After Colletti)"; Peter Hallward, "Anything Is Possible: A Reading of Quentin Meillassoux's *After Finitude*"; and Nathan Brown, "The Speculative and the Specific: On Hallward and Meillassoux," in *The Speculative Turn: Continental Materialism and Realism*, ed. Bryant, Nick Srnicek, and Harman (Melbourne, 2010), pp. 84-91, 130-41, and 142-63.

14. 齊澤克在若干著作中反駁現代主義論點，為普世真理辯護，例如 Slavoj Žižek, *In Defense of Lost Causes* (New York, 2008)。芭克-摩絲亦於其著作中建立一個主體奠基於真理的普世性之上而非受限於零碎主體性之理論，參閱 Susan Buck-Morss, *Hegel, Haiti, and Universal History* (Pittsburgh, 2009)。

哲學的貧乏：唯實論與後福特主義(下)*

The Poverty of Philosophy: Realism and Post-Fordism (2)

蓋洛威(Alexander R. Galloway)/著

王聖智/譯

三、歷史的數學

現在，讓我們思考一項更針對梅亞蘇立場之批判，這項批判乃圍繞著數學與歷史的問題展開。

人們無庸置疑地會回想起對過去數個世代以來的重要形上學評斷。在機械鐘錶時代，上帝即為鐘錶匠，宇宙依據天體音樂(the music of the spheres)的律動運轉。在蒸氣引擎時代，人類即為發電機，社會乃一部可被駕馭或可供利用的巨型機器。如今，在這個演算法時代，純數學主宰著這個世界，並從中提取價值。¹⁵

今日生產模式的基礎建設為何？它包含了所有的傳統類別(categories)，例如固定資本與可變資本。然而，軟體的普及使得今日的生產模式不同於所有其他生產模式。當今的經濟不僅是由軟體(符號機器)驅動，在許多情況下，經濟本身即為軟體，因為它主要是透過對數學資訊的編碼及處理來提取價值。孟山都(Monsanto)、易速傳真(Equifax)或 Google 在某個基本層次上均為軟體企業。作為全球產業龍頭之一的 Google 利用圖形理論(graph theory)的純數學獲取貨幣價值。孟山都將生命有機體轉譯為生物資訊基因序列，進而對它們進行資訊處理。在消費信貸領域，易速傳真利用複雜的演算法從資料庫中提取價值。然而，軟體究竟是什麼？軟體是由結合數學函數(例如加法、減法，以及真偽邏輯)與邏輯控制結構(例如「若 x 則 y」)的符碼所構成。簡言之，軟體即數學。電腦科學乃數學的分支。

在今日的後工業社會中，真實的生活經驗究竟為何？同樣地，此問題的答案並非秘密：人類今日的生活經驗即為各種數學例程，依據數學化效率圖表的行為泰勒化(Taylorization)，被設計從網絡中提取價值的資料採礦軟體，運用圖形理論(原為幾何學的分支)賦予社會網絡貨幣價值(monetization)，以及依據對安全漏洞與威脅的拓撲分析而採用的安全協議(protocols)。¹⁶

我們無法忽視下列這項事實：今日的生產模式是如此有利於軟體，進而使軟體即

* 原刊於《藝外 ARTITUDE》，2014年8月號，第59期，頁72-81。

為數學。一個簡單的三段論(syllogism)便可闡明今日生產模式與數學之間的特殊關係。因此，軟體便成為當代哲學的眼中釘。

如同本文開頭對巴迪歐及 Java 之評論所示，當今的數學式學科(例如電腦科學)邏輯與生產模式邏輯之間存在某種趨同性(convergence)。¹⁷ 我們可將此種趨同性視為唯實論與唯物論這兩門思想學派的主要分界線。唯實論將當今的符號邏輯、幾何學、線性分析、集合論、演算法、資訊處理等排除於差異本體史(ontic history)之外，亦即實例的歷史(但不必然是本質的歷史)之外。唯物論則認為這種數學化(mathematization)存在於當今生產模式的核心部位，因此它不僅推動歷史進展，在某種基本意義上，這種數學化本身即為歷史。¹⁸

當然，哲學領域對數學之起源已有相當長久且深入的討論。數字究竟是如同人類的十根手指那樣真實存在於這個世界上，抑或如同三角形特性(triangleness)那般的純粹概念？康德(Immanuel Kant)認為任何數學式評斷均為人造的(synthetic)，但仍為先驗的(a priori)。據此，當我們說明 5 加 7 等於 12 時，便已在某種東西(譯按：數學因素)尚未出現於 5 加 7 的特性(five-plus-sevenness)中之前將之**增添**於 12 的特性(twelve-ness)中。此乃一項值得說明之挑釁，正如康德於其《純粹理性批判》及《任何一種能夠作為科學出現的未來形上學導論》(譯註：《純粹理性批判》之總覽與補充)中所主張，數學式評斷必須具備「某種具體形象」，而非僅為可表述的「純粹理解與純粹理性」。¹⁹ 我無意深入這項錯綜複雜的辯論，而是提出一項涵蓋範疇較小，但較適合說明當今情況之陳述：當今的數學式評斷不僅是人造的，亦為歷史性的(historical)。與其分析做出(如康德所做的)數學式評斷的可能性，我想要分析的是做出這種評斷—並將之工業化、開展它，以及賦予其價值—所涉及的事物。因此，人們可能視此種企圖為針對哲學唯實論、尤其是梅亞蘇論點的**後福特主義式(post-Fordist)回應：自從軟體融入歷史後，我們不能亦不應再以非歷史之方式來理解數學**。鑑於軟體與當今生產模式之關係愈趨緊密，此項論述對工業化現代性而言普遍為真，在後福特主義之下尤為如此。

因此，我們不應信服梅亞蘇所謂「數學位於歷史之外」的論點。我們再次回想梅亞蘇對於所謂物件的主要特質之描述，亦即超乎我們理解範圍的某物屬性：「所有可用數學語彙表述的物件面向均可被認為是該物件本身的重要屬性」。難道這類表述不須被歷史化嗎？難道「對物件面向的數學語彙表述」不具備歷史獨特性嗎？難道「數學在論述廣大外在世界方面之能力」不具備歷史獨特性嗎？當然，這些表述具有明顯的歷史獨特性，也必須被歷史化。我們可視此種歷史獨特性為工業化現代性，或是更具體界定為後福特主義(亦即軟體化的)現代性。的確，數學或許曾在某段時間全然處於人類感知及經驗之外，因此開啟了一扇窗口，通往梅亞蘇所期盼的絕對性或主要特質領域。然而，當今的計算、數學、演算法，以及程式設計已明確地與人類日常經驗相連。(事實上，我在此所言乃較溫和之立場。採取較激進的德希達式立場者會認為此一面向，亦即邏各斯[logos，宇宙萬物運行之規律或原理]，始終徘徊於人類心中。)因此，若我們被迫在後福特主義

之下保留這項主要/次要術語—且我們無法確定是否應該保留—由數學推導而來的物件特質必然將由社會與主觀意識決定，因而動搖其作為「主要」之地位。

此處重點不在於責怪梅亞蘇忽略人們應隨時將事物歷史化這項根本規則。因此，針對唯實論之批評並非只是單純地重現左派(the Left)的古老獨特形式：將x歷史化，其中x等於任何事物(據此，我的批判乃針對歷史的數學，而非數學的歷史)，重點更在於正確識別當今可供歷史化之材料為何。換言之，我們必須闡明數學不再是被用以理解人類存在的中立解釋性工具，因為各種工業化-數學化過程可謂早已對歷史本身產生影響。²⁰

胡塞爾(Edmund Husserl)在二十世紀早期提到「歐洲科學危機」，以及現代性的實證科學之手如何掌控人類生活世界時，敏銳地注意到此種世界-歷史轉變：「我們必須注意某件最重要的事，這件事甚至早在伽利略時期便已發生：以數學方式建構的理想世界暗中取代了真實世界，亦即透過人類實際感知給定的世界、人類所體驗且能夠被人類體驗之世界—我們的日常生活世界。」²¹ 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在悲嘆「世界圖像時代」之來臨時亦提出類似觀點：「世界圖像在本質上不應被理解為一幅代表世界的圖像，而是將世界本身設想並掌握為圖像。如此一來，**存有者**整體而言便被以下列方式看待：唯有當存有者被**具備表象能力與闡述能力的人類**所設置時，存有者才是真正存在著。」²² 我們必須記住，現象學之興起乃對實證科學重新定義人類形式企圖之回應。這對胡塞爾而言至關重要，對海德格亦然。人們總是以規範性甚至道德性的語彙來闡述他們的論點，而實證認知科學則在道德上威脅著現象學主體。畢竟，現象學乃浪漫主義的亞種(subspecies)，因此，無論這些實證主義志業起源於科學還是哲學，現象學總是對它們抱持強烈懷疑態度。就現象學而言，對任何問題之解答總是存在於感覺主體不可化約的真實性(authenticity)當中，而絕非枯燥的數學及科學計算。

這並非意味數學無法論述實在。它顯然可以。此處關鍵在於，正因數學本身—如同演算法—在電腦化資本主義時代儼然成為歷史性的行為者，使得人們無法在數學論述實在之能力此一問題上保持**中立**。

我再次引用梅亞蘇提出的難題：「數學論述這個廣大外在世界之能力；論述人類及生命出現之前的歷史之能力，是我們必須面對的一道難題。」然而，在模控學之興起、基因組的數學化、Google 網頁排序演算法之發明、網路社交網絡的工業化，以及數位鴻溝日漸擴大之後，任何關於數學對實在進行無中介之論述的討論均顯得虛偽或缺乏品味。

哲學與電腦科學並非毫不相關。事實上，它們之間具有某種緊密連結，且已維持一段時日。舉例而言，集合論、拓樸學、圖形理論、模控學，以及廣義系統論均為忠實傳承這些科學領域原則的物件導向電腦語言，以及以德勒茲(Gilles Deleuze)、巴迪歐、魯曼(Niklas Luhmann)與拉圖爾為代表人物的近代大陸哲學共有的知識發展脈絡。德勒茲所謂持續控制下的社會(control society)若非源自

維納(Norbert Wiener；美國應用數學家)對模控學之定義，那麼又是從何而來？²³ 拉圖爾的行動者(actants)概念若非源自系統論，那麼又是從何而來？布萊恩特的「創造差異的差異」若非源自貝特森(Gregory Bateson；英國學者，研究涵蓋眾多學科)的資訊理論，那麼又是從何而來？

基於此種關聯性，我便可重申本文開端提到的兩項問題。首先是意識形態批判的問題：倘若新興唯實論確實為當代資本主義之鏡像，難道它不啻僅為當代意識形態的重新包裝，且因其反科學傾向而遭受質疑？再來則為**政治性**問題：由於任何試圖以類似腹語術方式表現當今產業布局的哲學方案將因此被視為某種政治倒退，因此，即使將意識形態完全擱置不論，難到我們不應單純基於政治理由而質疑它？

物件導向的民主將會是何種模樣？此乃拉圖爾提出的唯實論式挑戰，亦為其在2005年舉辦於德國卡爾斯魯爾藝術與媒體中心(Zentrum für Kunst und Medientechnologie; ZKM)「公諸於世」(Making Things Public)展覽的龐然目錄中所提出的問題。²⁴ 然而，此類民主早已存在。它們的醜陋光輝無遠弗屆，它們的物件導向基礎設施從我們的生活網絡中挑選出未償付的剩餘價值。它們提供進出邊境加工廠(maquiladoras)的通訊管道。此類民主奉市場法則為圭臬(rule of the market)，而與民有(rule of the people)較不相關。它們所謂的唯實論僅有排斥及競爭的冷酷邏輯，而與真實的物質歷史無關。鮑爾(Nina Power；英國羅漢普頓大學資深講師)在反駁哲學唯實論時說得好：「倘若唯實論最終成為一種逐底競爭(race to the bottom)，以證明每個實體均與其他實體同樣無意義，那麼唯實論又有何用(就此方面而言，原子論者做得比唯實論者更好)。」²⁵

四、結盟式的政治

回想沙特(Jean-Paul Sartre)與海德格於1946至1947年間關於參與(engagement)和人類存在本質問題之意見交流有助於我們的討論。沙特清楚地說明他的立場：政治參與意指透過人類**存有者**(human beings)以及為了人類**存有者**的參與。

人類赤裸裸地存在。...人類只不過是自我塑造之物，除此之外什麼也不是。此乃存在主義(existentialism)的第一項原則...我無法得知俄國革命將如何發展。我可以欣賞它，並將它作為一個例子，因為如今無產階級很明顯地影響著俄國的發展，其影響程度非其他國家的無產階級可比擬。然而，我無法斷言這必然將促成無產階級的勝利：我只能談論我所能見到的事實...畢竟，人們指責的並非我們的悲觀，而是我們僵固的樂觀。²⁶

海德格在其回應中稍微修改了沙特的用語：參與意指透過存有的事實(truth of Being)以及為了存有的事實之參與。在此類實體政治的建構過程中，我們不僅須注意此類實體本身，更應注意它們存在的事實。即使存有相當難以捉摸，我們仍

應盡力找出它存在的事實，以使人類能夠發展出某種理解它的方式。

海德格將存有描述為同時最接近人類亦最遠離人類之形態的段落，可謂他與沙特之意見交流中最令人驚豔的部分：「『存有』—既非上帝，亦非宇宙真理。存有比所有存有者更遠於人類，同時比任一存有者更接近人類，無論該存有者是一顆石頭、一頭野獸、一件藝術作品，一台機器，一位天使或上帝。存有最接近人類，卻依然具有最遠離人類之形態。」²⁷

一邊是海德格，另一邊是沙特。一邊是存有(本體-神學絕對性)，另一邊是存有者(具有歷史建構的物質性實體)。就讓這成為最原始的試金石：哲學家追隨的究竟是本體論的絕對性，抑或物質性的歷史？究竟是物件關係構成的真實網絡製造出歷史，還是歷史製造出物件關係的真實網絡？人們對這些問題的回答將顯示出他們在當今辯論中所採取的立場。人們若非珍視以絕對性形式存在的純粹本體論，亦即救世主、無限，或習稱為上帝，便是重視浸透在物質生活所有細節中的各種世界的歷史性。簡言之，哲學唯實論中的「實在」意指絕對性，而對唯物論者而言，「實在」意味著歷史。²⁸

因此，一項更大的問題仍尚待解決：如同物件導向哲學及思辯唯實論之類的運動是否具有某種政治性？若有，它又是什麼？此外還有一項更重要的問題，讓我們稍微改寫本文開端引用瑪拉博所提出的挑戰：我們應如何使思想不再從根本上與資本主義精神完全一致？

在未受約束之情況下，新興的哲學唯實論與最嚴格形式的資本主義唯實論之間幾乎不再具有任何差異。²⁹ 人類與垃圾具有平等地位(equal footing)的世界是何種世界？³⁰ 其景觀為一個混亂的無物世界，不具核心，且非由必要邏輯(梅亞蘇)或市場邏輯(拉圖爾)推動的世界是何種世界？僅存留貧瘠的、整體化的虛無主義絕對法則之世界是何種世界？

當我們處理政治性任務時有兩種基本選擇。一種是結盟式(aligned)的政治，另一種則為非結盟式(unaligned)的政治。結盟式政治受限於一套道德評斷標準，並具備能夠追求此種標準的倫理機制。此處所謂的道德範疇意指一套必須遵守的法則或必須實現的目標，倫理範疇則意指一連串規範行動的實踐，當這些行為被觀察到或付諸實踐時，總是具有特定目標取向(不一定是道德性目標)。因此，人們可以在不具備道德觀之情況下抱持某種倫理思想；同樣地，人們可以在無法採取倫理實踐之情況下抱持某種道德觀。如此一來，結盟式的政治便是指稱倫理行動之向量直接指向某個特定的道德結果。相反地，非結盟式的政治則是指稱那些不受道德法則約束之方案。非結盟式政治方案也可能透過倫理領域向量之引導而形成某種令人生畏的慣性，不斷地將整個領域疆域化與去疆域化。這些方案處於非結盟狀態，因此就像傭兵一樣不斷地在朋友與敵人的角色間變換。倘若巴迪歐的方案乃結盟式政治方案之典型，具有一套明確的倫理機制支撐其道德事實，那麼德勒茲的方案便為非結盟式政治方案之典型，在其中，一片廣大的物質力量向量

場域壟罩著一個不存在的道德上層建築(superstructure)。³¹

唯實論乃一種非結盟式的政治。因此，關鍵不在於唯實論是好是壞，而在於唯實論會招致危險。唯實論在其非結盟狀態(unalignment)當中始終缺乏某種與絕對性的真實關係，因為它放棄了做政治性決定之權力。³²

相反地，唯物論乃一種結盟式的政治，因為它指認出某種如絕對道德範疇之類的事物(亦即歷史，社會總體性)，並且以主導實踐之必要策略來支撐此範疇(商品、意識形態批判、辯證法，以及其他事物的去神秘化)。

唯物論最終信奉的究竟是什麼？任何事物均源於物質生活與歷史，而非抽象過程、邏輯必要性、普世性、本質、純粹形式、精神或思想。因此，新興唯實論的真正貧瘠之處並非在於其輕信數學理性與物件導向架構，而是它無法認清絕對性的最高秩序—亦即總體性(totality)—事實上存在於人類的物質性歷史當中。接觸絕對性即意味著思考此種關聯性，但這並不代表為其辯解，而是揭示思維本身即為此種關聯性。據此，思考物質性即意味著使我們的思維在歷史心靈當中蔓延擴散。

註解：

15. 確切地說，此項宣稱並未牴觸勞動價值理論(labor theory of value)。數學演算法或許有助於擷取價值，但被擷取的剩餘價值本身必須先被人類勞動力創造出來。Google 即為一個極佳範例。在 Google 的伺服器場(server farms)中大部分的勞動均由在龐大機器群上執行的叢集演算法(clustering algorithms)來實行。儘管如此，被擷取的價值乃是由廣大的全球網路使用者所付出的微型勞動力(micro labor)一點一滴累積而來。網路使用者在寄發電子郵件、發布線上訊息，或是更新網站時，都在付出他們的微型勞動力。因此，Google 只是從由人類勞動構成的資訊網絡中提取價值。

16. 關於此種轉化如何影響文本與文本標記之分析，參閱 Alan Liu, "Transcendental Data: Toward a Cultural History and Aesthetics of the New Encoded Discourse," *Critical Inquiry* 31 (Autumn 2004): 49-84.

17. 一項更深入且更難以說明的問題是：這種趨同性是否不僅發生於數位資本主義時代，而是一貫的情況？舉例而言，泰勒化時期已顯示出某種特殊類型的生產模式數學化(mathematization of production)，更早時期的馬克思著作中所提到的交換價值(exchange-value)與積累(accumulation)等基本概念亦顯示出此種趨同性。

18. 術語的精確性在此處至關重要。本文所謂的**唯物論**是指歷史唯物論(historical materialism)，亦即馬克思著作及其後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所展現的歷史唯物論哲學。我們必須注意勿將此概念與某些科學家與哲學家慣用的「物質主

義」一詞混淆。例如哈曼便將物質主義定義為原子論(atomism)的某種形式，亦即把最小物質元素視為建構世界上所有事物並決定其特質之基礎。因此，對哈曼而言，物質主義乃一種哲學立場，宣稱「所有巨型實體最終將被化約為遠比任何事物更真實的精細微小的物質元素」。參閱 Harman, *Prince of Networks: Bruno Latour and Metaphysics* (Melbourne, 2009), p. 6.

19. Immanuel Kant, *Prolegomena*, trans. Paul Carus (Chicago, 1902), pp. 17, 14.

20. 這使我想到懷海德(Alfred North Whitehead；英國數學家暨哲學家)在論及數學在思想史中的中心性(centrality)時發生的一件啟發性軼事。「我不會宣稱在未深刻研究歷代數學思想之情況下建構一套思想史，就像將哈姆雷特(Hamlet)從以他的名字為題的戲劇中省略。這是過度的宣稱。然而，這必然近似於將奧菲莉亞(Ophelia)的部分從哈姆雷特劇中刪除。這樣的明喻是格外精確的，因為奧菲莉亞對此劇至關重要，她相當具有魅力—而且有點瘋狂。」參閱 Alfred North Whitehead, *Science and the Modern World* (1925; New York, 1970), p. 20.

21. Edmund Husserl, *The Crisis of European Sciences and Transcendental Phenomenology: An Introduction to Phenomenological Philosophy*, trans. David Carr (Evanston, Ill., 1970), pp. 48-49.

22. Martin Heidegger, "The Age of the World Picture," *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and Other Essays*, trans. William Lovitt (New York, 1977), pp. 129-30；強調處為本文作者所加。

23. 德勒茲所採用之**控制**概念源自於柏洛茲(William Burroughs；美國文學家暨社會評論家)—德勒茲曾參加1975年舉辦於哥倫比亞大學的「分裂-文化」(Schizo Culture)研討會，此研討會影響深遠，伯洛茲在會議中進行一場題為「控制的僵局」之演講—然而，德勒茲所採用之**控制**一詞的真正來源亦非秘密，亦即模控學、系統論、元胞自動機(cellular automata)、圖形理論，以及其他相關領域。

24. Latour, "From Realpolitik to Dingpolitik or How to Make Things Public," in *Making Things Public: Atmospheres of Democracy*, ed. Latour and Peter Weibel (Cambridge, Mass., 2005), pp. 14-43.

25. Nina Power, "The Dialectics of Nature," bit.ly/Pn6i5o. 物件導向哲學之提倡者如波格斯特(Ian Bogost)或布莱恩特可能會倒轉鮑爾問題之核心，改為探問這些實體是否具有不同程度的意義。

26. Jean-Paul Sartre, "Existentialism Is a Humanism" (1946), in *Existentialism from Dostoevsky to Sartre*, trans. Joan Stambaugh, ed. Walter Kaufman (New York, 1989), pp. 290-91, 299, 301.

27. Heidegger, "Letter on Humanism," trans. Frank Capuzzi and J. Glenn

Gray (1947), *Basic Writings*, ed. David Farrell Krell (New York, 1977), 此文乃針對弗雷(Jean Beaufret)之回應，但其內容則是關於沙特的“Existentialism Is a Humanism.” 此小節內容相當重要，因為它包含了海德格對馬克思之罕見參照，海德格認為馬克思的歷史觀是「相當卓越的」(p. 243)。

28. 這些選項的構築因此導致某種誤解，必須在此釐清。這並非意味要在人文主義與非人文主義之間抉擇，本文提及的眾多思想家視之為康德主義(Kantianism)與唯實論之間的抉擇。我的論點並非在損害非人類性(the nonhuman)之情況下，針對沙特式或其他類型人文主義之輓歌。這是一場偽辯論。如同我在此所宣稱，這場辯論並非唯實論與康德主義之間的辯論，而是唯實論與唯物論之間的辯論。換言之，關鍵不在於物件相對於人類，而是真實性相對於歷史，因為，正如我們所知，物件和我們一樣都具有歷史。

29. 此種表述乃借用於費雪(Mark Fisher)引人入勝之著作 *Capitalist Realism: Is There No Alternative?* (London, 2009).

30. 若干當代唯實論哲學家均採用「平等地位」之概念，而哈曼或可算是最熱衷於重申此概念之哲學家。他在許多地方均曾引用此概念，例如他最近談論拉圖爾之文章“*What exists is only actants: cars, subways, canoe-varnish, quarreling spouses, celestial bodies, and scientists, all on the same metaphysical footing.*”的開頭幾頁。同一篇文章隨後亦提到關於垃圾(garbage)之評論：「我們已明白拉圖爾堅持物件的絕對民主：一隻蚊子與拿破崙同等真實，而垃圾筒中的一塊塑膠與一枚核子彈頭亦為同等的行動者。」參閱 Harman, *Prince of Networks*, pp. 22, 34.

31. 當然，這並非全然為真，如同德勒茲的著述經常被用於積極反駁對所有滲透人類日常生活力量之曲解，這些力量包括自我(ego)、父權、壓抑、國家，甚至是辯證法。儘管如此，德勒茲主義(Deleuzianism)在近幾十年來已處於非結盟狀態，逐漸漂離其最初的政治目標(或是因為這些目標已被實現而導致此種漂離)。

32. 關於此論點最具啟發性的陳述當屬巴迪歐的點論(theory of points)，此理論認為任何一個點均會被引誘脫離各種平坦無調性世界之間相互抵銷的沉淪(neutralizing depravity)，並且老練地沿著決策的二元軸線形成聯盟。參閱 Badiou, *Logics of Worlds: Being and Event*, 2, trans. Toscano (London, 2009). 「點(a point)乃事實出現的先驗性試驗場。...點乃形體無限性之具體化—齊克果(Søren Kierkegaard; 丹麥哲學家)稱之為『二擇一』(the Alternative)—亦為『若非/即為』之具體化，我們亦可稱之為一個選擇或決定。」(pp. 399, 400). 或如霍爾瓦德所言：「點乃某種處所，在其中對世界之參與可能會極化為某種簡單的是或否、贊成或反對、前進或後退等等。」參閱 Peter Hallward, “Order and Event: On Badiou’s Logics of Worlds,” *New Left Review* 53 (Sept.-Oct. 2008): 106-7. 巴迪歐稱此種平坦無調性世界為「民主唯物論」(democratic materialism)。鑑於我

在本文中所使用之術語，這種拉圖爾-哈曼式的物件—而巴迪歐對此可能也不會反對—應被更精確地稱為民主唯實論(democratic realism)。關於巴迪歐對民主唯物論與辯證唯物論(dialectical materialism)之區分，參閱 Badiou, *Logics of Worlds*, pp. 1-4.